

蒋介石个性与宁波地域文化

贺 淵¹

【提要】本文着重以蒋介石在宁波期间的活动为考察对象，从山水一世界、信仰的烙印和教化的传承三个方面，呈现蒋介石的个性与浙江宁波地域文化之间的关系。

【关键词】蒋介石 溪口 四明山 文化

有道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浙江宁波奉化溪口镇走出的蒋介石，身上携带着的四明文化特质，一如他浓重的乡音，终身未变。蒋介石自1887年诞生到1905年前往日本，一直在宁波地域内学习生活。1906年东渡日本开始，蒋介石长年在外，母亲王氏在世时，他每年回乡多次，1921年蒋母去世后，蒋说：“余葬母既毕，为人子者，一生之大事已尽，此后乃可一心致力革命，更无其他之挂系。”^①但是，1927年至1949年间，除溪口被日本占领时期以外，他总计回故乡的次数依然有24次，相当于每年回乡一次以上。即使不在家乡，异乡的景象常常令他联想起四明的山水。他和故乡这种难分难解的情结，缘于故乡是他的精神家园。本文着重以他在溪口时的行为，从山水一世界、信仰的烙印和教化的传承三个方面，呈现蒋介石的个性与宁波地域文化之间的关系。

一、山水一世界

蒋介石酷爱山水，《蒋中正总统五记·游记》开头便记有：“公世居浙江省奉化县溪口镇武岭之下，其山自四明、石窗、徐凫、雪窦诸奇峰而来，盘纡深峭，奇丽雄峻，号曰武岭。水则剡源，九曲之下游也，涌碧涵净，如被绮縠，号曰锦溪。公生此山水胜处，自幼便爱游览。”^②蒋介石成年后，每次回到故乡，除1937年年初因腰伤而外，游历四明山水都列入他的日程安排之中。

四明山横跨余姚、上虞、慈溪、鄞州、嵊州、奉化六市区，共280峰，主峰金钟山1018米，大俞山峰上有四窗岩，岩内有四穴，仿佛安有窗户以通日月之光，所以称为四明。黄宗羲在《四明山志》^③中记有雪窦山及其附近徐凫山、大小晦山，和著名的剡源九曲的山光水色，并略涉传说人文，还描绘了千丈岩瀑布、妙高台、藤龛、含珠林、锦镜池、入山亭、狮子岩、翰林松、徐凫山、剡溪等景观，并附有各代文人咏诵的诗句100余首。诗文从唐代到清朝历代都有收录，包括王安石、曾鞏、郑清之、楼攻愧、汪灏、宋琰、李濂等著名诗人或是僧人的佳作，让一座寂静的山林，充满喧闹的人声。从中可见，四明山之一峰雪窦山及剡溪历来是骚客们诗意的林泉，也是失意士绅散发怨气寻求平和的所在。

关于千丈岩瀑布，王安石有诗曰：“拔地万重清嶂立，悬空千丈素流分。共看玉女机丝挂，映日还成五色文。”“素流分”与“五色文”，尽显古人写景怡情的风雅；（宋）皇子诗：“来访名山登古迹，一亭清秀换双瞳。寒岩碧耸高深涧，素练云飞落半空。徒觉襟怀尘不染，允知景物胜难穷。此山即是蓬莱阙，四顾繁华一笑中。”^④面对深涧、瀑布、古亭，换了“双瞳”，洗却“尘埃”，对于世俗之“繁华”，报以“一笑”，潇洒地表现对于尘世的不屑。

¹作者：贺渊，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研究员。（北京 100000）

² ①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蒋介石年谱》，中国档案出版社，1992年，第75—75页。

②黄自进、潘光哲编：《蒋中正总统五记·游记》，“国史馆”出版，2011年初，2014年印刷，第1页。

③黄宗羲：《四明山志》，《黄宗羲全集》第二册，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301—303页。

关于妙高台有宋代郑清之的诗：“陆地芳洲拥翠翘，巨雷穿石滚云涛。搏空苍凤欲飞舞，奔海玉龙争怒号。万象横陈坤轴富，一亭平挹月轮高。独醒未觉孤清景，笑酌寒泉读楚骚。”^② 在轰鸣与怒号的自然怀抱里，享受清静，以寒泉代烈酒，品味独醒的自在；还有明代邬鸣雷的诗：“高台独立倚罡风，我欲持刀断古松。尽彻攀援与覆盖，一丝不挂坐虚空。”^③ 看似写景，实为赞叹道家的修行，所谓虚无之道的上乘者，达到一丝不挂，一尘不染，如皓月当空，万里无云的境界。

相传黄巢葬于含珠林，宋代僧鉴关于含珠林发出感慨：“图王争霸业，自古仗戈矛。英风今何在，都成一古丘”^④，由黄巢之冢而看破红尘。《红楼梦》中“古今将相今何在，荒冢一堆草没了”，意趣与之完全一致。

九曲剡溪，每一曲留下一些故事。一曲叫六诏，相传是王羲之隐居之地，当时皇帝下诏六次请他出山，他仍不出，所以取名六诏；二曲在蹲驻，地名来源于五代时吴越忠懿王为看望隐居于此的陈殿中曾在此驻足。明高启有诗：“殿中初未仕，高节振衰谢。读书在兹邱，萧然竹间舍。王来有深言，留宿山水夜。谁云南阳翁，独枉将军驾。”^⑤ 赞赏文人清高的气节，表现出中国文人独立不羁的个性；七曲，元陈基有吟：“七曲班溪好隐居，昔人卜筑有茅庐。至今兰若诸天外，犹见琳琅炳梵书”^⑥，其中的“隐居”、“茅庐”指代桃花源，“兰若”、“梵书”，则体现佛教清静与梵音的传送。

林林总总，诗句赋予四明山太多的内涵，儒、释、道相分相融，从王羲之到陈殿中，从黄巢到王安石，从士绅到逃犯，从诗人到僧人，这些大多在现实中没有交集但却徜徉在同一地点的人们，拥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摆脱政治和现实的困扰。

故乡的山水，令蒋介石欲痴欲狂，以此为荣。1920年8月，蒋介石回家乡游雪窦山，在山上连住七日，《游记》载：“飞雪亭崖侧，有大松树，公尝倚松俯瞰千丈岩之瀑，会大雨，不忍遽返，曰：‘树杪水飞，溅珠喷玉，观此奇景，不知通身之淋漓也。’又登妙高台，台据崖突出，危然凌空，公登而乐之，望见众山之小，诸流之细，而数里之外，屋舍俨然，则所谓亭下村也，公尤喜望不厌。又游三隐潭；……及至第三潭，曰：‘此潭最胜。’盖第三潭为一大岩窟，宽二丈，高百米突，峭壁回合如盖，日光自缝隙而入，照见细流涓涓自右来，明砾如珠子跳跃，故公叹观止焉。”^⑦ 大雨不返，危崖乐攀，见细水落地如珠而惊叹，在山林中肆意释放，体悟……

1924年蒋介石投身于国民革命之中。戎马倥偬之际，撰写《武岭乐亭记》，并请谭延闿书写，刻在碑石上，立于文昌阁一侧。文中写道：“武岭突起于剡溪九曲之口，独立于四明群峰之表，作中流砥柱，为万山所景仰。不偏不倚，望之岿然，其独以武岭名者，殆取义于武德，即其地以况其所居之人耶。岭之上，古木参天，危崖矗立，其下有潭，流水潆洄，游鱼可数，牧童渔夫，徜徉其间，乐且无穷。其幽静雅媚之景象，窃叹世外桃源，无事他求矣。而隔溪之绿竹与岭上之苍松，倒影水心，澄澈皎洁，无异写真，其有岁寒君子之逸致乎。”^⑧ 此段文字，写出了他对于故乡山水的理解。前一部分写山，凸现一个“武”字，崇尚“中流砥柱”、“万山景仰”，以武德作为武岭人所具有的品德，充满着有所作为的愿望；后一部分写水，似乎可以概括成“逸”字，但求清静无所他求。两种相互矛盾的欲求，并立于这篇小文章中，涵盖着中国文化中士绅的思想：出世则独善其身的佛老思想，入世则兼善天下的儒家思想。

自然的风景能够滤去蒋介石心头的烦躁，抚慰他的心绪。1932年6月，蒋介石身处九江，9日他在日记中写到：“政治事业，不能脱离，然此心未尝一日忘于林泉之间，尤以恋恋于故乡风物，不能忘也。”第二天的日记中他继续写道：“在林泉间，精神畅舒，性情恬逸，故心思专一，对于国防与政治，皆能发幽抉微也。”^⑨ 解释之所以不能忘记林泉的原因。

不仅如此，有时自然风景的外观，还被蒋介石当成自我精神的物化表现。1928年9月，他与宋美龄同游雪窦山。在三隐潭旁边，立有一石，挺立如笋，宋指着这块石头说：“‘此介石也！’公莞尔领之。览观逾半小时，曰：‘徘徊不忍舍也！’”^⑩ 本真得近乎幼稚。

³ ①②③④⑤⑥ 黄宗羲：《四明山志》，《黄宗羲全集》第二册，第303、304、305、306、317、319页。

⑦ 《蒋中正总统五记·游记》，第4页。

故乡山水确实能够给予蒋介石一种超脱的力量。1949年1月至4月，蒋介石下野后，一直住在溪口。他多次带着儿孙们翻山越岭，大有踏遍四明山水之势。3月19日，他在日记中写道：“朝课后研究《四明山志》之‘二十里云’而‘过云’、‘桃花坑’及剡溪九曲地段摘录数条记……甚愿再访石窗一次，以及东乡之金鹅，与南乡之鮀琦亭、鄞城山古迹，未知果有此福否？”^④预感着前景不妙，情绪颇为低落。但他仍看着当地的县志，对照黄宗羲的《四明山志》，规划出行线路图。4月11日，山外已到了改朝换代的时刻，李宗仁的代表张治中正在与共产党就战犯是否举名、中共是否过江、联合政府何时成立进行谈判。这天夜晚，蒋介石“妙高台独坐，闲吟，得‘静观明月松间照，闲听清泉石上流’成句”^⑤，借用王维的名句，前面分别加上“静观”和“闲听”二字，感觉他尽力置一切于度外，追寻超脱现实、优哉游哉的爽快。天亮以后，带着儿孙下属再游北溪、大俞等地，一游就是二天。沿途，他给蒋经国等人介绍景色典故，甚至还发现了黄宗羲书上没有记载的四隐潭。是告别？还是再度与自然交流？不管怎样，他似乎是完成了自己的心愿。

山水美景，给予蒋介石精神上的归宿感。早在1920年11月，蒋介石曾经暗自发誓：“我与林泉，盟之夙矣，功成退隐，切莫迟迟。”^⑥林泉之于蒋介石，不是为了遁世，恰是入世，是与山外世界平行的另一世界。

二、信仰的烙印

宁波、整个江南以致于华夏文化圈，以儒、释、道为信仰主流，派系分明，教义内涵却渐渐地合流混杂，中国社会对于信仰和宗教的态度与西方不同。钱穆先生甚至认为：“宗教为西方文化体系中重要一项。中国文化中，则不自产宗教。”^⑦少林寺供奉释迦牟尼，也供奉孔子、老子，寺中的对联是：“百家争理，万法一统；三教一体，九流同源”，体现了中国人多神教的特征。这种态度，对于蒋介石的信仰及其对信仰的态度产生颇深的影响。

蒋介石早年生长的环境，佛教气氛浓烈。宁波的阿育王寺、天童寺和溪口的雪窦寺，在晋朝已经建立，盛行于唐宋，一直香火不断。蒋氏家族与佛有缘。雪窦寺供奉的是弥勒佛，又称布袋和尚，其大肚、盘腿、笑口常开的原型为五代时的明州高僧契此，契此被认为是弥勒“分身”示现。蒋氏家族迁四明后，第二代远祖蒋宗霸，曾拜布袋和尚为师，并随师傅四处云游，口中常念“摩诃般若波罗密多”，被称为“摩诃居士”。晚年，蒋宗霸在宁波东乡小盘山建了弥陀寺，并葬于寺边。蒋介石曾多次登上小盘山，谒摩诃祖师之塔墓。1922年，蒋介石第三次来谒，并流露出想“解脱尘缘”的愿望^⑧。

蒋介石的祖父、母亲都是虔诚的佛教徒。蒋介石10岁时到雪窦寺，11岁时首次出游天童寺、阿育王寺等，12岁那年去往母亲王氏曾经带发修行的法华庵进香，都是母亲带着他去的。以后，蒋介石回乡，特别是母亲已经去世后，法华庵成为他流连之所，他曾专

⁴ ①蒋介石：《武岭乐亭记》，载《蒋中正自反录》第1集，香港中和出版有限公司，2016年，第322–323页。

②《蒋中正日记》1932年6月9日、6月10日，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收藏。

③《蒋中正总统五记·游记》，第40页。

④《蒋中正日记》1949年3月19日。

⑤《蒋中正日记》1949年4月12日。

⑥《蒋中正总统五记·游记》，第5页。

⑦钱穆：《现代中国学术论衡》，三联书店，2005年，第1页。

门出资修护法华庵。他的发妻毛福梅也是长年念经吃斋，毛福梅于 1931 年出资在丰镐房之北建立了纪念蒋宗霸的摩诃殿。潜移默化中，佛教的观念态度对蒋介石产生深刻的影响，甚至到 1928 年 2 月他在游南京宝华山慧居寺时，还笑着对宋美龄说：“余终久必为僧也！”^②

然而，二十年代佛教正处在自身难保的危险境地。自从自由主义、唯物主义等新思潮兴起，特别是吴稚晖、丁文江倡导科学反对玄学，把矛头对准了佛教等等的“迷信”，在全国得到极大的响应；基督教的大面积传播，同样给予传统的佛教极大的冲击；更为严重的是，佛教本身的世俗化，以及寺庙的资产引来的觊觎，给中国的佛教带来劫难。近代以来“庙产兴学”的口号，对于教育的兴办很有好处。但是，到了 20 世纪 20-30 年代，社会动乱，造成庙产完全没有保障。1927 冯玉祥在河南毁佛，还俗者有 30 余万人，没收城隍、东岳庙等财产，包围相国寺，他的属下石友三火烧少林寺，中原寺庙僧众颇有灭顶之感。1927 年 8 月，蒋介石下野回乡，此时浙江省政府正有有“逐僧之议”^③，佛教界大为不安。

也许是因缘际会，蒋介石成为佛教的保护人。1927 年 9 月，蒋介石邀请太虚大师来雪窦寺，他们进行了长谈，第二天正值中秋，大家一起赏月。大师即景赋诗，有“千古相知有明月，一生难忘是中秋”之句。对于这次会面，印顺和尚在所著《太虚大师年谱》中颇有深意地说：“国民政府下之佛教，得以从狂风暴雨中复归安定，得以泄沓混日，确与此夜此人有关。”^④

1928 年 6 月 23 日，太虚应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介石的邀请来到南京，蒋介石在总司令部见了他。第二天在同游汤山时，太虚大师谈及：“佛学为世界人类最高理想之表现，其救世之精神，非其他学术宗教所可及。必适应时代之思潮，国民之生活，方可推行无阻。际此训政伊始，百度维新之际，最好能组织一能统一僧俗两界之佛学团体，俾收民富国强，政修俗美之效。”^⑤ 蒋介石表示赞同，并为太虚写了几封信，让他去找时任国民政府主席的谭延闿、国民党元老蔡元培、钮惕生、李烈钧、张静江、薛笃弼、王正廷等商量办法。有了这些人的支持，太虚于 7 月 28 日在南京毗卢寺，成立中国佛学会筹备处。至此，国民政府下，中国佛教开始出现正式组织雏型。太虚领导的佛教改革，虽艰难但却有效地起步，期间，蒋介石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蒋介石并没有像他自己说过的那样：“余终久必为僧也。”一方面，出世不符合他的本性，另一方面，他自小生存的环境，信仰庞杂而自由，决定了他对待宗教的松弛态度。比如，蒋介石 14 岁时，和母亲同去天童、阿育王寺礼佛后，又到灵山参观葛洪炼丹处。日后，蒋介石成为一个早晚都做祷告的虔诚的基督教徒后，但这并不妨碍他一如既往地踏入天童寺、阿育王寺和法华庵等。1949 年 4 月 7 日的日记写着：“昨夜宿金鹅寺中……朝课毕，出寺巡游……再至罗汉院基址……”^⑥ 夜里住在佛教寺庙里，起来后在庙里做基督徒的祷告，他做起来却毫无抵牾之感。

事实上，蒋介石在很长一段时间，基本持多神的观念，体现多神、敬祖、拜英雄等中国宗教观念的特征。例如，在武岭门外，武山南麓，有一座武山庙。此庙本是溪口镇任姓、宋姓、单姓、张姓、蒋姓五家共祀之庙。清末，蒋介石的父亲蒋肇聰曾被推为庙首，对庙进行日常管理，并召集五姓族长，对武山庙作了大规模的扩建。蒋介石也曾经多次在此许愿求签^⑦，出资修庙。随着在外的征战，尤其是北伐胜利进军和统治区域的扩大，蒋谒拜之庙越来越多。比如：1928 年 4 月 19 日，占领邹县，蒋介石自徐州前往孟子庙。22 日，“谒孔庙。登杏坛，观诗礼堂，瞻圣像，行三鞠躬礼，曰：‘庙宇规模宏大，殊罕见也！’”29 日游徐州子房山（子房即张良），“入子房庙，瞻谒子房神像，作赞词曰：‘为国报仇，仇报身藏，步趋昔贤，神驰心往！’”^⑧ 1928 年 11 月 24 日，“谒包孝肃公祠，曰：‘包公之像，文雅清秀，不若世俗戏剧所扮演者之狠也，可知刚直者，其面容不必狠焉。’二十五日……过中庙，观昭忠祠……二十八日，到安庆，出西门，谒徐锡麟祠”。^⑨ 文庙、武庙不论，上至两千年前的孔孟，下至十几年前的徐锡麟的祭奠祠堂，都一一参拜。

⁵ ①② 《蒋中正总统五记·游记》，第 7、35 页。

③④⑤ 释印顺：《太虚大师年谱》，宗教文化出版社，1995 年，第 129、123、139 页。

⑥ 《蒋中正日记》1949 年 4 月 7 日。

不仅如此，在民间广为流传的鬼神、谶纬以及其他灵异的观念，也是人们精神生活的一部分，并影响到蒋介石。现在去丰镐房，可见蒋母王氏生前所居住的二层小楼，屋外建有一通往二楼的扶梯，扶梯很窄，只可一人通过，上楼之人左右两手都可以够到扶梯。据解说员介绍，该楼梯建于1928年，距蒋母离世已经七年，蒋之所以命人造此扶梯，是考虑到蒋母已在另一个世界，作为儿子的蒋介石想换扶老母已无可能，故而建此楼梯方便她上下。解说员由此赞叹蒋的孝顺。建此楼梯的初衷和提议是否出自蒋，但至少说明，蒋相信灵魂不死。

带有神秘色彩的托梦之说在民间深入人心。雪窦山上有座御书亭，上有宋理宗御书“应梦名山”，缘于宋仁宗曾经梦游“八极之表”，醒后命人将天下名山绘好呈上，结果发现四明雪窦与梦境相合，于是有“应梦名山”之誉。梦在蒋介石的生活中，也同样有着预兆等神奇的作用。1920年10月，蒋介石到香港祭朱大符，对大符的去世痛哭不已。后来，蒋介石和陈炯明发生争论，蒋介石主张攻石龙，陈主张攻博罗。“夜，公梦见大符者三，情景宛然，因起坐祷曰：‘我必率队攻石龙’，乃不复梦。”^④意思很明确，朱大符已死，通过托梦的方式，支持蒋的意见。1921年5月24日，蒋介石晚上梦见大雪，“念母年来多病，此必凶兆，乃告辞归。六月十四日，母王太夫人卒”^⑤。在江浙一带，一直流传着梦见大雪必有丧事的说法，蒋介石也深以为然。所以，他在日记里，常常会出现梦境，并力图解梦。

蒋介石最终受洗并接受基督教，从他的信教过程，可以进一步了解他对信仰的态度和演变。关于受洗，蒋的日记是这样写的：“23日晨到上海，谒见岳母病态颇重，其精神远不如上年，心甚忧闷。老人爱婿等于爱子，先慈既弃养，但愿岳母长寿，故受洗礼之心益切，以偿老人之愿，使其心安病痊也。下午请江长川牧师在岳母家，余受洗礼。岳母顿佳，心为之慰。”10月24日，再记日记：“人欲至今横流已极，几无，至今欲防微杜渐亦无其道，惟有使人人精神上受一种高尚之信仰，教义乃为余精神惟一之信仰，愿从此以后，以基督为余模范，救人救世，永矢勿怠也。”^⑥他之信教，一是出于孝顺，为了让岳母高兴，看到岳母即想起自己的母亲，又见岳母病重，顺她之意受洗，最后“岳母顿佳，心为之慰”；二是以此为一种适合的教义，以便于社会的教化；三是为自己心中树立一个榜样。几天后，他又写到：“余对

耶稣一生之事业，尤为钦感。至其生前与死后神话，则可勿论也。”^⑦因此，他最初接受的耶稣是一个人，一个奋斗中人。然而，1936年西安事变时，被软禁的他看到突然出现的宋美龄，思绪出现了变化：“今日清晨偶翻旧约，得某章有‘耶和华今要作一件新事，即以女子护卫男子’云云。午后余妻果至，事若巧合。然余妻冒险相从，非受宗教素养甚深者不可能也。”^⑧他似信非信地感到有上帝的启示一说。宋美龄危难之间的举动，他理解成宗教素养使然而非爱情的力量，也可见宋美龄给予蒋介石的感觉，或者说蒋介石感到世俗的情爱已经不足以体现宋的精神世界之高尚。基督教的神圣之感在他心里显现。

上帝的力量在蒋介石心里不断上升，也使他对耶稣的信仰越来越坚定。他在危难之间，往往会向主祈祷，寻求主的帮助。西安事变时，他寻求主的帮助，抗战失利时他寻求主的帮助。1944年4月，日本发动打通大陆交通线的战役，国民党军大溃败，下半年，衡阳之战时，蒋介石急得要自杀，不时祷告，他甚至许诺：“上帝赐我衡阳战事胜利，许以六十生辰建立大铁十字架于南岳顶峰。”^⑨这种对待主的方式，与原罪之下的忏悔和祈求主的宽恕，存在境界上的差异，倒是更加接近于献上贡品求佛保佑。

⁶ ①参见裘国松：《溪口谈助——蒋氏故里文化品读》，宁波出版社，2015年，第5页。

②③ 《蒋中正总统五记·游记》，第36—37、44页。

④ 《蒋中正总统五记·爱国记》，第5页。

⑤ 《蒋中正总统五记·困勉记》（上），第12页。

⑥ 《蒋中正日记》1930年10月23日、10月24日。

在形势不可逆转，自己无法把握时，尤其在1949年兵败如山倒之际，蒋介石不得不离开溪口之时，他的日记写着：“《约伯记》一章二十节‘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又十三章‘他虽杀我，我还要信制他！’今日南京混乱陷落，局势恶劣，党国危急，声名扫地至此，余之内心实感激上帝不知所止，并深信现局如此，是上帝所预定，亦为余预料所及，惟信赖上帝必能使我家转危为安，革命转败为胜之信念，亦毫不动摇。朝晚课业自验生生不息之意与光明中和之象，亦并未减损耳。……上午二谒母墓，告别依依不忍舍，似有母灵慰留之象……”^⑦他将目前的败局归于主，并视为上天给予的锻炼，相信冥冥之中的定数。在对主的祷告中，感受到光明的前程，拥有了必胜的信心，他转而感激主。然而，“似有母灵慰留之象”一句话，暴露出他仍然属于溪口，他还是能够“看到”门后、屋角暗处的“没脚佬”^⑧。

三、教化的传承

蒋介石少年时期接受的是以儒家思想为主的传统教育，这些思想成为他日后的核心思想。从社会影响力上看，甚至可以这样说，蒋介石是曾国藩之后儒家思想最有力的传承者。

蒋介石在故乡完成启蒙教育。如今，在溪口的展柜中，摆放着他曾经使用过的教科书，包括：《大学》、《中庸》、《论语》、《孟子》、《神童诗》、《礼记》、《千家诗》等。10岁后，蒋介石读《春秋》、《诗经》、《古文辞》、《尚书》、《易经》、《左传》，1902年16岁时在毛思诚指导下，圈点《纲鉴易知录》、《礼记》、《周礼》等，他曾试图走科举之路，因1902年参加童子试未中而作罢。18岁时受业于顾清廉，学习性理之学，也就是以王阳明为代表的理学，包括曾国藩的著作，这是当时普遍的正统教育。后来，在日本留学时蒋介石在武士道的精神中重逢王阳明的思想，他如获至宝，将王阳明的“致良知”，说成是正统的“儒道”，视为日本成功的关键。在此基础上，创造出所谓的“力行哲学”。蒋介石强调说：“王阳明‘知行合一’的哲学，我是自十八岁，从读顾葆性先生时候起就开始研究的；以后五十年来，更曾经读了再读，研究了再研究，他的《传习录》与《〈大学〉问》这两个小册子，真是使得我百读不倦，心向神驰，不知其乐之所止。”^⑨蒋介石了解王阳明及其思想，推崇桐城派中兴人物曾国藩，开始于故乡。

正统的儒家思想，指导着蒋介石的行为方式。孝道，是儒家文化的根本。宁波地区，尤其将“孝顺”作为一个人安身立命之本。蒋母去世后，蒋介石不但认真选墓址，建墓地，修墓庐慈庵，并通过“事死如生”的方式，预定在母亲的墓的下侧为自己的墓地，以便死后可以“长伴母灵，侍候永久”，以示孝。为显现“孝”道，他将自己的长子蒋经国过继给弟弟，因为，“吾母为配王氏女合葬之，且为之立嗣，以志不忘。今吾生有二子，以母命长孙经国为吾弟后，然吾家族规殇者勿能传，吾于此既不能遽破族规，以贻来者之口实，而又不忍重违母命，以伤骨肉之至情，不获已仍以长子经国嗣之，并以此状载诸族谱，表之墓碣，以为吾弟一线之延，世世子孙，读斯文者，知吾母与吾今日哀其子若弟之苦心，庶奉吾弟祭祀，永永弗替，则吾二十年来耿耿难忘之隐衷，至是或可稍舒矣”^⑩。其弟蒋瑞青去世时只有4岁，王母后来给他举行了冥婚，并要求蒋介石将长子经国过继给瑞青，虽然不合族规，但蒋介石还是遵从母意，在族谱上写了下来。蒋母的要求充分体现以血脉的延续作为生命存在的意义的传统思想，蒋的行为则遵循了孝道中的“顺”字。他推崇曾国藩家书，他对于蒋经国等下一代，特别强调曾文正公对子弟的训戒，可以作为家训加以传播。

⁷ ①《蒋中正日记》1930年11月1日。

②《西安半月记》，秦孝仪编：《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35卷，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4年，第188页。

③吕芳上主编：《蒋中正先生年谱长编》第七册，“国史馆”、中正纪念堂、中正文教基金会，2015年，第703页。

④《蒋中正日记》1949年4月25日。

⑤浙江人对于人死后离开肉体的魂魄的称呼。

蒋介石在效仿的过程中，逐渐树立起这样的信念：“在中国政治哲学上，很明显可以看出大部分就是伦理哲学：从一个人的修身推到亲亲，再从亲亲推到睦姻任恤，推到仁民爱物，甚至一切的制度和组织，也染上了不少伦理的色彩，这是中国政治哲学的特点。”以伦理为基础的政治和以法制为基础的西方政治相比，蒋介石认为伦理政治更为优越。他说：“伦理乃从人类本性上以启发其自觉心的，法制是代表着国家公共权力，而带着强制性的；伦理不仅是指明某种行为是正当的，而是从人生意义上探求为什么这种行为是不正当的？法制只是行为的正当与不正当，不容许人们逃避其所当为，或为其所不当为而已。所以伦理的教义，比较法制更积极、更自然、亦更能深入于人心。”^⑧蒋介石推崇伦理政治，以为这种政治将一个人由内而外，一步一步地推展开去，其层次分明，步骤确实，可操作性强；更符合人类的本性，他强调凡是人类，必有他与身俱来的天性，比如爱父母、爱家庭、爱民族、爱国以及爱人类，因此建立在伦理之上的政治才是最有根底的，最完善的。

蒋介石把伦理建设的基本方针定为“倡明我国固有的伦关系”和“恢复民族固有的道德”。蒋介石要恢复的旧道德包括“三达德”即智、仁、勇；“五达道”，指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五伦；“四维”也就是礼、义、廉、耻；“八德”包括忠、孝、仁、爱、信、义、和、平。他自觉地继承儒家情礼重于法的观念，表示“政治上一切法律制度，和负政治责任者的生活行动态度，皆要合乎礼”^⑨。强调自我修养，由内而外，由己及人，由亲至疏的秩序，达到各得其所的目的。

蒋介石对于家族的重视，超过了同时代的众多政治人物。他不但喜欢任用亲戚，而且热衷于修家谱和族谱，不但修了蒋氏宗谱，还将母亲王氏一族的家谱也托人修订，目的是为了荣宗耀祖，激励后辈，完成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全过程中的重要一环。同样，作为一代领袖的蒋介石于认祖归宗兴趣盎然。在日本占领他的故乡之时，蒋经国派人秘密把蒋氏族谱从溪口运到江西，再由江西运往重庆，蒋介石见到族谱后，激动不已，“余三复循诵，几忘寝食”。抗战胜利后，蒋即命人开始修族谱，1948年6月11日，蒋介石于南京撰写《为武岭蒋氏宗谱手书先系考序》^⑩，全文追溯溯源，对于武岭蒋氏一族的来龙去脉交待得一清二楚，对修谱过程及自己所作努力一一叙述。由此可见在这件事上他的确是尽力又尽心。1949年，国民党统治岌岌可危，蒋介石本人下野，他回到溪口，他急于完成的一个重要工作就是组织人马修成《武岭蒋氏宗谱》，可见这份宗谱在他心中的分量之重。

但是，人们却可能忽略了另一个非官方的学派对于蒋介石的影响。这就是“浙东学派”。蒋介石曾称：“在我十八岁的时候，最欢喜读的第一本书就是邹容的《革命军》，第二部书就是王阳明的《传习录》，第三部书就是黄梨洲的《明夷待访录》。第一本书是启发民族大义，确立我革命思想的基础，第二部书是阐明‘致良知’的道理，奠定了我求学作事的根本，第三部是贯注我民主思想的精神”。^⑪蒋介石此言不虚。他在1941年多次对青年团干部讲话中强调，“宋元学案与明儒学案，为中国完美的教育哲学史”“在宋元学案和明儒学案里面，我们可以看出，当时学者大师精微的理论，谨严的修养，亲切的心传和感化的功效。”^⑫他在几次演说中提到：“我们将黄梨洲的《明夷待访录》与卢梭的《民约论》两相比较，就可以知道我们中国政治哲学比之十八九世纪的西洋政治哲学，要切实而伟大，而且在黄梨洲以前我们中国历代还有许多阐扬民治理论的政治哲学，如稍加整理阐述，就可以发现他是有原理有方法，本末兼赅，体用具备，可作研究民主制度的基本理论的。”^⑬可见他对于黄宗羲的思想的推崇。

似乎当时的宁波，更欢迎黄宗羲这位绍兴人，除了黄宗羲的个性和人缘方面的原因外，更为主要的原因是宁波自宋明以来经济发展，有渐出小农经济范围的趋势，特别是明末清初这一带普遍地抵抗清政权，清初宁波地区停止科举，长达六年，断绝了文人的生路，使他们转而经商。新的气象，带来了新的思想，以刘宗周和黄宗羲为代表的浙东学派将新的思想传播开来，使原本就务实而又彪悍的宁波人的这种性格更加突出。

⁸ ①蒋介石：《革命教育的基础》，《先总统蒋公全集》第2册，中国文化大学出版部，1984年，第2379页。

②蒋介石：《亡弟瑞青哀状》，秦孝仪编：《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文录》第35卷，(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党史委员会，1984年，第58—59页。

③④ 蒋介石：《政治的道理》，秦孝仪编：《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专著》第6卷，第145、136页。

⑤秦孝仪编：《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35卷，第208—209页。

但是,蒋介石是有所选择地推崇黄宗羲。黄承认人的“自私”本性,蒋却要“存天理,灭人欲”;当他在反对清政府时,黄的民主思想显然是有力的武器;当他在反对引进西方民主的时候,又以中国本已有之的态度,否定西方民主传入的必要,于是将黄学作为盾牌,说到底,是一种功利主义的态度。

维护伦常、维护宗法制度,宣扬儒家思想,不是宁波地域文化的特性,而是中华文化的共性。不过,在欧风美雨为潮流,苏俄文化为先进的20世纪,蒋介石坚持儒家文化,在全国大搞新生活运动,回家乡则处处彰显孝子形象,努力制造家族氛围,将自己塑造成传统文化的传承者。他的这一特质,恰恰与宁波乡土的气候相适宜。正如程虎啸先生所说:“先进思想家从西方引进,并以微弱的资产阶级经济关系和职能集团为依托的民主、自由、平等的现代化观念与信息,像油浮在水面上一样地漂浮在广阔的乡土文化带的上空,而亿万老百姓却在同一时代场景中基于传统的民族性、国民性,表现出另一套欲求……”^⑨虽然他所讲的是清末的情况,但似乎也适用于民国时期。蒋介石保守的文化观有着深厚的基础,即使是在风气先开的宁波。

归纳全文,可以看到,四明山水给蒋介石提供了一个与现世并行的可以徜徉其间的另一个世界;故乡人们的宗教信仰给予他的是一个宗教态度,让他可以轻松地将命运也就是未来交给上帝;真实世界,则是运用他在家乡接受的儒家的正统思想观念来应对。这样的蒋介石仿佛总是生活在三个不同的世界里:山水世界、现实世界和未来世界,但都不同程度地与他的生长地宁波有关联。^⑩

⁹ ①③蒋介石:《哲学与教育对于青年的关系———中华民国三十年七月九日对青年团中央干事会监察会联席会议讲》,见秦孝仪编:《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演讲》第18卷,第270—271、266页。

②《青年团工作根本要旨———中华民国三十年七月二日出席三民主义青年团全国干部工作会议讲》,见秦孝仪编:《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演讲》第18卷,第240—241页。

④程啸:《文化、社会网络与集体行动———以晚清教案和义和团为中心》,四川出版集团巴蜀书社,2010年,第148页。